



刘昌宇

我的阅读

“红楼”器物里的生活美学

黄欣著述的《再进大观园：红楼梦博物纪》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，2025年10月出版），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与学者的严谨，将曹雪芹笔下的器物风俗从纸页间唤醒，化作一座触手可及的纸上博物馆。书中没有宏大的理论框架，只有对一茶一饭、一扇一衣的细腻考据，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《红楼梦》的体温。

黄欣的笔触如绣娘穿针，将散落在《红楼梦》中的文化碎片缀连成锦。从栊翠庵的六安茶到蘅芜苑的冷香丸，从滴翠亭的团扇到潇湘馆的丝桐，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士大夫的美学追求。在“品茗煮雨”一章中，作者不仅考证了茶叶的产地与焙制工艺，更由妙玉奉茶时“一杯为品，二杯为饮”的妙语，剖析出古代文人“茶格即人格”的精神境界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让读者恍然惊觉：原来曹雪芹笔下的每一缕茶烟，都藏着对生命质地的叩问。

书中对“物”的解读，超越了简单的器物志。黄欣以戏曲家的敏锐，捕捉到《红楼梦》中戏文与人物命运的隐秘关联。在“元音乡声”一章中，他揭示黛玉生辰时上演的《蕊珠记·冥升》，嫦娥坠落凡尘、终未嫁而亡的剧情，竟与黛玉“绛珠还泪”的宿命形成奇妙互文。

黄欣的考据，既有文献的严谨，又有田野的鲜活。他不仅从《长物志》等典籍中溯源，更深入各地的市井巷陌，寻找《红楼梦》中的生活痕迹。在“斯园膏脂”一章中，他考证“酒酿清蒸鸭子”“芦蒿炒干子”等菜肴，竟与南京人“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”的俗谚暗合。这种将文本与地域文化结合的写法，让读者恍若置身于大观园的厨房，看柳嫂子如何用寻常食材烹制出诗意。书中对“十番”乐队的考证尤为令人印象深刻——作者通过清代绘画与文物图片，试图还原出贾府“私立女子乐队”用笛、管、笙、弦等十种乐器演奏的盛景，让读者仿佛听见了文字背后的丝竹声。

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黄欣在书中倾注了对传统文化的深情。他记录下苏绣传人如

何用双面纱技法再现“雀金裘”的华美，古琴名家如何以丝桐之声演绎“碣石幽兰”的雅致。这些内容不仅是技艺的展示，更是对“工匠精神”的礼赞。在“黼黻烟霞”一章中，作者详细解析了贾宝玉紫金冠的形制，并指出其与戏曲中“太子盔”的关联，甚至联想到孙悟空花果山造型的渊源。这种将文学、戏曲、民俗熔于一炉的写法，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收获“原来如此”的惊喜。

黄欣的写作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敬畏。在“阊苑名筑”一章中，他不仅考证大观园的园林布局，更关注贾母糊窗的“四色软烟罗”如何影响室内光影。这种对细节的痴迷，源于作者多年在昆曲舞台与古琴案前的浸润。书中对“冷香丸”的解读尤为细腻——作者指出其制作过程实为合香工艺，需将白牡丹、白荷花、白芙蓉、白梅花的花蕊与雨水、露水、霜雪、腊雪调和，暗合宝钗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的品格。这种将物性与人性结合的解读，让读者不难看到曹雪芹笔下的每一味香料，都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。

本书令人称道的是，作者没有把《红楼梦》视作高不可攀的“神”作，而是以平视的眼光，将器物风俗等活态的文明，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美学，着意让经典回归日常。在“大河之洲”一章中，黄欣描绘黛玉北上时走过的大运河，以其繁忙的漕运串联起南北文化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《红楼梦》不仅是贵族家庭的兴衰史，更是中华文明流动的画卷。书中对“五香大头菜”的考证，从黛玉的食盒延伸到江南的酱菜工艺，更让我们明白：原来经典中的烟火气，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。

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仍在用双手延续着书中的技艺，当读者在大江南北的市井巷陌间寻访《红楼梦》的生活痕迹，我们终于懂得：经典从未远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我们的日常里——茶烟氤氲中、丝竹声声里、衣襟纹样间，依然令人魂牵梦萦。

特别推荐

以笔墨为刃 铸红色报魂

赵晓林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，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、以报为阵，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。近日，文学博士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路英勇创作的纪实文学《急先锋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本书以五四运动“总司令”陈独秀、革命先驱李大钊、“红色报人”邵飘萍为叙事核心，通过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如何成为唤醒民众、凝聚力量的急先锋。

1921年前后，中国社会风云激荡。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，李大钊主持《晨钟报》，邵飘萍以“铁肩辣手”之笔揭露社会黑暗，他们通过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批判旧制度，唤醒沉睡的民众，揭露社会黑暗，唤醒广大民众，凝聚革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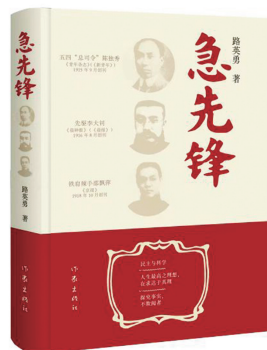
力量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，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深厚的群众根基。

本书生动刻画了这些进步人士如何从办报到建党，从思想启蒙到革命实践，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础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历史场景，展现他们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的赤子之心，他们身体力行，以文字为刃，以精神为火，唤醒沉睡的大众，共创全新的世界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文字如何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刃。

作者巧妙融合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，以纪实文学的独特形式，打破传统党史著作的框架，让历史人物鲜活可感。书中不仅还原了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的思想轨迹，更通过邵

飘萍等人物的视角，展现了革命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抉择。

《急先锋》不仅是一部纪实文学，更是一曲献给革命先驱的赞歌。它以生动的叙事、严谨的考据，让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与信仰的光芒。



深度解读

一个充满生态智慧的文学世界

张泽坤

生态文学作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类型，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与反思。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大省，其文学创作经历了从“人定胜天”到“天人和諧”的转型，而葛水平的《山下午锄二》（希望出版社，2024年7月出版）正诞生于这一转型完成的时代节点。

《山下午锄二》虽然呈现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哲思。小说通过少年万周视角，观察吐月村的自然风物、动物生灵与人的互动，构建了一个远离都市的乡土生态空间。

《山下午锄二》采用儿童视角作为叙事核心，这不仅是一种技巧选择，更是生态意识建构的策略性安排。少年万周（外号“一碗粥”）的认知发展过程，本身就是生态伦理的觉醒过程。小说通过这一视角，实现了生态意识从蒙昧到觉醒的渐进式呈现。

万周对自然生灵的态度转变是小说的一条重要暗线。最初，他对蛇充满恐惧，后来有了跟随五叔进山的经历，他逐渐认识到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存在价值。当五叔放走小蛇时说“它还是一个蛇娃娃”，万周开始体会到对生命的尊重。这种认知转变在“土花蛇复仇”事件中达到高潮：成群土花蛇的出现让他们感受到自然的反噬力量。这一情节设计，巧妙地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法则。

万周剪马尾巴毛的情节是小说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出于好意的错误行为——想帮助五叔制作二胡，导致了马的痛苦。通过这一事件，万周不仅认识到“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完整性”的生态伦理，更体会到人类欲望与自然权益的边界。万周向王大爷和马道歉请求原谅的描写，将生态关怀提升到生命平等的高度。

万周在柳树河嬉水、在山间采蘑菇、听王大爷讲动物故事的经历，构建了个体与自然的情感联结。小说通过对这些童年体验的细腻描写，暗示了早期自然接触对终身生态观念形成的奠基作用。

《山下午锄二》中的人物形象承载着不同的生态观念，他们之间的互动与转变，反映了乡村生态伦理的现代转型。

五叔万国兵是小说中最具生态象征意义的人物，展现了从征服者到守护者的蜕变。他最初以“打蛇人”身份出现，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姿态。然而，随着叙事推进，他逐渐展现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尊重。他放生小蛇，寻找蟒蛇却最终放弃猎杀，最后承诺再也不打蛇，这个转变过程象征着人类从自然掠夺者向生态守护者的角色转换。

王大爷作为吐月村的长者，是民间生态智慧的化身。他讲述的黄鼠狼、狐狸的故事，不仅富有文学趣味，更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智慧。如黄鼠狼用野味交换幼崽的故事，揭示了人与自然生灵的互惠关系；“狐狸想做人”的传说，则反映了乡土文化中对自然灵性的认同。王大爷对万周的教育方式，体现了民间生态知识的代际传承机制。他不是通过训诫，而是通过故事、谚语和生活实践，将生态伦理内化其中，达到入心入脑的教育效果。这种教育方式区别于学校的知识学习，更贴近生活，也更具文化的传承性。

以李伟为代表的城市儿童与万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们折磨土花蛇的情节，反映了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。而他们因为恐惧而慌乱奔逃，则暗示了这种疏离导致的精神失衡。通过这些对比，小说隐晦地批判了脱离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。

《山下午锄二》通过乡村少年的成长故事，构建了一个充满生态智慧的文学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对话，不是索取而是互惠，不是征服而是共生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厚的乡土情感，完成了从“环境文学”到“生态文学”的审美跃升。

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，《山下午锄二》提示我们：真正的生态转型始于心灵，成于文化，而文学作品正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。

